



逃避自治：作为普遍盲从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法]C. 卡斯托里亚迪斯 著 方 珏 译

2009-05-26

【内容摘要】基于由每一个时期所创造并在每一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那些想象的意义，本文对历史进行了分期，并主张，就二战之后的这一时期而言，其主要特征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之消弭，以及自治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运动后的衰微。精神创造领域内的颓丧，作为这个时期的标志，反映在了后现代主义的勃兴，然而，通过为盲从袭习与陈词滥调提供一种假模假式的（high brow）“护教学”，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反映出了，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还合理化了盛行的那些风潮。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盲从主义 自治

无疑，“后现代主义”这一标签并没有也不能界定当前的时期或者刻画它的根本特征。但它却非常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时期。它表明了这个时代那可悲的无能——无能将它自己想象为某种肯定的抑或“就是这样的”东西，这种无能导致它将自己仅仅定义为“后某某”，也就是说，以某个过去是而如今不再是的为参照系来定义自身，而且还使得它试图以一种古怪的论点来自我美化，即它的意义就是无意义，而它的风格就是缺乏任何风格。

然而，在“后工业的”与“后现代的”这两个词之间做出区分是值得的。“后工业的”这个词在现实中自有其对应的东西。简短地说，至少在（但不仅限于）富裕国家，生产（无论这个词可能意指着什么）正在远离老旧肮脏的工厂与高炉，转向日益自动化的联合企业与多样化的“服务业”。至少在半个世纪前便已预见到的这个过程，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被认为是担负着与人类的工作与生活的前景相关的非凡期许的。人们被告知，工作时间将大幅度缩减，工作性质也将发生根本转变。自动化（操作）和数据处理本应该将旧有的那种重复性的、异化的工业劳作转化为一个为工人的发明能力与创造性的自由扩展而开放的领地。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变成铁板钉钉的事实。新技术所提供的诸多可能性只限于一个由聪明的年轻专家们所组成的非常有限的圈子内。而对于剩下的大多数雇员而言，不管是在工业还是在服务业中，工作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毋宁说，伴随着工作节奏与产出率屈从于非人格化的机械控制，老式的“工业化”已经侵袭了非工业部门的大公司。数十年来，工业雇佣率一直在下降，“剩余的”工人与新手大多只能在第二等级的、薪水微薄的“服务”产业中找到受雇机会。比如，从1840年到1940年，一周的工作时间已从72小时削减到40小时（减少了45%）。实质上，从1940年以来它大致维持不变，尽管每工时产量的增长率有着显著的提速。因此而造成的剩余工人要么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主要在西欧），要么不得不委身于“服务业”（主要在美国）。

即便如此，下面这一点却仍然是真的：在人类（富裕的那部分“人类”）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上，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正在发生变化，至少是潜在的变化。几千年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农业、矿业

与制造业、运输业)首次占用了不到1/4的总劳动成本(和工作人数),并且可能只占用这一数量的一半,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体系中存在着难以置信的浪费(农民们接受补贴却不投入生产,过时的工业与工厂一直保持运转等等)的话。如果不是因为对于新的“需求”的持续制造以及大多数产品必要的报废,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所占用的人类时间甚至可能近乎于零。简而言之,一个闲适的社会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的,然而,一个为所有人保有创造性的、个性化的工作角色的社会,现在看上去却仍然很遥远,正如在19世纪时一样。

二

如果认定任何命名都是约定俗成的,那么“后现代”这一术语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不太经常为人注意的是,这种荒谬是派生的。因为“现代”一词本身就是不恰当的,而其不恰当之处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显现。“现代性之后”到来的是什么呢?一个自称为现代的时期,它意味着历史已经到达其终点,而从此以后人类将生活在永久的现在。“现代”一词表达了一种深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我们是现代人”的宣言先掏空了任何真正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它还包含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悖论。这一术语的自觉的想象成分使得现代性的一种自我描述——即对和未来相关的无限开放——成为必要,然而这一描述仅仅在与过去相联系的时候才有意义。他们是古代人,我们是现代人。可是,我们又如何称呼那些在我们之后的人呢?这一术语有意义,它仅仅存在于这一荒谬假设的前提下,即自我宣告的现代时期将永恒持续,未来将仅仅是一个延长的现在;而在其他方面,这完全违背了现代性的明确主张。

关于赋予“现代性”这一术语以精确的内容,在当代有两种尝试;对这两种尝试做一简短的讨论也许是一个有用的起点。非常特别的是,这些尝试关心的不再是社会历史的现实的变化,而是思想家们(哲学家们)对这一现实的态度变化,无论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变化。它们代表了作家走向自我限制的当代趋势:作家们写的是作家,为的还是作家。因此,福柯断言现代性始于康德,特别是在《系科之争》和《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两个文本中,因为哲学家康德首次对真实的历史的当下产生兴趣,开始“阅读报纸”等等(参见黑格尔认为阅读报纸是一个人的“现实的晨祷”的妙言)。①因此,现代性就是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性的意识。当然,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一个人特有的时代的历史性对伯里克利(这一点从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的悼词》中清晰可见)、柏拉图以及塔西陀和6世纪的格雷戈里(Mundus Senescit)来说是明确的。在福柯眼中,这种新奇在于,从康德开始与现在的关系不再根据价值比较(“我们堕落了吗?”“我们应当遵循哪种典范?”)来想象,不是“纵向地”而是以一种“和他们的现状有关的矢状(sagittal)”。但价值比较在康德那里是很明显的,对于他们而言,历史只能根据进步来反映,而启蒙运动就是这种进步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而且,如果一种“矢状”关系是与价值双峰对峙的,这只能意味着,思想若放弃其重要功能,就往往得从历史现实那里借鉴其标准。毫无疑问,这一趋势在19世纪和20世纪变得尖锐起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即使后两者是以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明天的现实即共产主义或超人的名义来对抗今日现实)。然而,这一趋势也是现代性中的一个难题:它可能永远不会被视为启蒙运动和后启蒙时期思想的总结,而且更不会过去两个世纪的真实的社会历史趋势。

同样成问题的是,哈贝马斯把黑格尔的哲学精神和现代性等同起来:“黑格尔是阐发现代性的明确概念的第一个哲学家。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②事实上,历史再次被思想史所替代;真正的斗争和冲突仅仅通过那些制度的二律背反中的苍白表象而存在。因此,哈贝马斯写道,只有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一个在现代性、时间意识和理性之间的概念星丛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见③,而看上去使他烦恼的是,“理性”被“膨胀成为了绝对精神”。但是,这种完全统一恰恰是黑格尔的幻想。没有人能忘记,不仅是黑格尔的原文,而且他哲学的整个结构、逻辑和动力都完美地通向前现代的主题,即“历史的终结”已经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在绝对知识体现于黑格尔体系之后,只需要做一些“经验的工作”。

事实上,黑格尔代表了现代性范围内和现代性的完全对立——或者更笼统地说,是和这种精神内的希腊-西方精神的完全对立——因为正是在他那里,理性和现实[=“当前”被解释为对理性的依次

体现的全面彻底的（总体的和完全的）回忆]的不合法的婚姻第一次得到了庄严的祝福。黑格尔写道：“哲学是在思想中把握到自己的（历史）时代。”哲学是时代的真理，它之所以为真仅仅是因为它在时代的思想范围内。但是，“时代”的特殊性——在黑格尔的时代之前以及之后——已经开始出现，即在思想和现实的历史活动中有一个明确的内部分裂，它显示为时代的自我争论，并显示为对现存的和制度化的形式提出质疑。“时代”的特殊性已经成为一种斗争，它是在君主制和民主制、财产权和社会运动、教条和批判、学院化和艺术创新等之间的斗争。哲学是能够成为时代的思想的，要么试图（用文字）调和这些对立——由此它必然会导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形成的一定程度的保守主义；要么忠实于其批判功能，而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使得时代概念化的观念荒谬不堪。批判需要距离，这种距离是相对于对象而言的，如果哲学是超越于新闻报道的，那么，这种批判则以建立这一距离的新观念的创造、新标准和思想的新形式为其前提。

三

我没有能力为这些时期提出新的名称，无论是称其自身为现代的时期，还是继现代之踵而来的那个时期。但是，在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欧洲历史（显然也包括美国历史）划分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特征描述的前提下，我将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历史分期。使我们自己回想起所有历史分期的概要式特征和忽视连续性所带来的风险，或者“主体的”要素的参与，这一切几乎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后者，它可以在被选择用来进行划分的那样一个基础之中发现，在这种基础之中，作为历史分期的尝试的奠基性工作的哲学的和理论的先入之见被精简化了。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它不得如其自身般被认识。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使这些先入之见尽可能的明确。我自己的先入之见是，一个时代的个性应建立在由其所创造并居于主导地位的想象的意义的特殊性之中；而且，如果不忽略从12世纪开始就展现在西欧的历史领域中的极其丰富多变的复杂性的话，那么，把握其特殊性的最适当方法是使它与（社会的和个人的）自治权的意义和事业相关联。这一事业的出现标志着和“真实的”中世纪之间的断裂。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可以区分三个时期：西方的出现（构成）；批判（“现代”）时期；以及退到盲从主义。

1. 西方的出现（从12世纪到18世纪初）

资产阶级的自我构成、新兴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或现存的城市不断变化的特征）以及对政治自治权的某种需求（始于完全自治的公共权力，依赖于事实和经济状况），伴随着新的精神的、心理的、智力的和艺术的态度而出现，这些态度则为对罗马法、亚里士多德以及整个现存的希腊遗产的再现与接受而导致的爆炸性结果准备了基础。传统和权威逐渐不再是神圣的，革新也不再是一个具有诋毁意义的字眼（正如它通常在“真正的”中世纪里的那样）。即使它只是以萌芽的形式出现——并处在对（教会和君主）权力的永恒妥协中，但事实上，政治和思想的自治权的事业在1500年的衰落之后重新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妥协在“经典的”17世纪形成，而这种妥协存在于社会-历史的运动和（或多或少被改革的）传统秩序之间。

2. 批判（“现代”）时期：自治与资本主义

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18世纪，随着启蒙的出现而开始变得自觉，并持续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自治的事业被激进化，无论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界。体制化的政治形式被质疑；需要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争论包括了超出狭隘的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财产关系、经济组织、家庭、妇女的地位和两性之间的关系、教育和年轻人的状况。在基督教时期，哲学第一次明确地和神学决裂了（至少到莱布尼茨为止，主流哲学家们还一直得提供上帝存在的“证明”等）。在理性的科学领域内，其作用和扩展出现了全面加速。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新形式的创造不仅激增，而且成为自身的自觉追求。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即“总体的（整体性）社会事实”被创造出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为了积累而无限地积累：它是积累的条件和手段间的不断转化，是生产、商业、金融和消费的不断革命。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性意义：“理性支配”的无限扩张。不久，这种意义开始渗透并倾向于塑造社会生活的全部（例如：国家、军队、教育等）。随着资本主义核心制度——公司——的成长，公司就体现为一种新型的官僚等级制的组织；渐渐地，管理技术官僚就成为了资本主义事业的合适的担当者。

“现代”时期（比如说，从1750年到1950年），它最好被定义为冲突，而且被定义为两种想象性意义（即一方面是自治，而另一方面是“理性支配”的无限扩张）的相互污染和纠结。它们含糊不清地共存于“理性”的同一屋檐下。在其资本主义的认可下，“理性”的意义是清楚的：它是“知性”（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知性”），或是我称之为“协同性-同一性的逻辑”的那个东西，主要体现在量化和引起“发展”本身的拜物教。立足于这一隐蔽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假设，即认为经济仅仅是多（产出）少（投入）的生产，那么没有什么（自然的或人类的“本性”、传统或其他“价值”）应该阻挡最大化进程的道路。一切都在（生产的）理性的法官面前被召唤，并且必须证明自己的存在权利，而这以“理性支配”的无限扩张的标准作为基础。通过无限地使用（虚假）理性的手段，以期实现一个（虚假）理性的目的，资本主义从而成为一个永恒的过程，即，它据说是理性的但实质上却是社会的盲目的自我重新制度化。

另一方面，就作为体现了社会和个人自治事业的社会-历史运动而言，“理性”最初是指在事实和法律间的明确区分，从而成为拒绝传统（现状声称它应继续存在，仅仅因为它发生在那里）的主要武器，并且是个人和集体为了调整他们的生活寻找自我或生产原则的可能性和权利的确定。然而，很快地，作为批判和说明的开放过程的理性，一方面被转化为机械地统一化的计算（已经体现在法国大革命中），另一方面被转化为一个可能的、包括一切的普遍的制度（在马克思的意图中清晰可辨并彻底影响着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转化提出了复杂、深刻而又晦涩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够在这里讨论。我只说明两点。首先，是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合理化”的普遍影响。第二，它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而且显然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思想倾向，即对绝对基础、绝对的确信性和穷尽性的追求。同一性的逻辑创造出自我奠基、必要性和普遍性的幻象。

“理性”——事实上是“知性”——于是提出将自己作为人类活动的自足的基础，否则，它将发现除了它自身之外别无基础。并且，此类“理性”的“客观的”对应物（和保证）不得不在事物自身之中被发现。因此，历史即理性。在人类的历史中，理性“意识”自身要么是以线性的（康德、孔多塞、孔德等）方式，要么是以“辩证的”（黑格尔、马克思）形式。最后的结果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经典的革命运动共同来分享进步的想象和如此这般的信念，即它认为技术-物质的力量同样是人类幸福或解放的（直接地、或稍事拖延，在一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决定性原因或条件。

尽管存在着这些相互污染，但这一时期的本质特点是两种核心意义之间的对立和张力：一方面是个人和社会的自治，另一方面是“理性支配”的无限扩张。这种张力的真正表达是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发展和持续。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试图表明的那样，这种斗争本身已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社会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必要条件，成为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不合理性的一种牵制。④ 这个不安分的社会——智力的和精神的不平静——一直是“现代”时期狂热的文化和艺术创造的背景。

3. 退到盲从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的出现，工人运动的瓦解（既是灾难性地滑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结果，又是其条件）以及进步的神话的衰退，这些标志着西方社会进入到第三阶段。

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有利位置上，1950年之后的时代主要以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的衰退为其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过去的40年（自1948年起）见证了一些重要运动（妇女、少数民族、学生和青年）所带来的持久影响。然而，这些运动不仅以半失败而告终，而且它们中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新的社会景观，并同样无法面对全部的政治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运动之后，自治事业似乎完全黯然失色。人们也许认为，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期的事态发展。但随着当代社会隐私权比重的日益增长，去政治化和“个人主义”是最不可能做出这一解释的。一种随之而来的、与之相关的严重症候则是政治想象力的完全萎缩。和保守者一样，“社会主义者”智力的贫困化十分惊人。“社会主义者们”无话可说了，而过去15年间经济自由主义的辩护者们所具有的知识素养和产出也许会使得斯密、贡斯当和密尔不安于地下。罗纳德·里根就是这一历史的象征意义的杰作。

一种广为传播的、愈演愈烈的集体失忆症，是形成“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大陆保守的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的意义上）的庞大受众的条件。以下即是这一趋势的两种突出情形：（1）“代议制民主”批判的消逝；（2）对20世纪30年代最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斯拉法、罗宾逊、卡恩、凯恩斯、卡莱茨基、沙克尔——的破坏性批评的完全消失，它先前针对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想要成为的

“理性”。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其中，学者们的思想倒退是骇人听闻的。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这一广为人知的“共识”之下，所有的调查和民意测验都显示出一种对于制度权力（政治家、商界、工会和教会）的深刻怀疑和犬儒主义。

我并没有建立什么“因果”联系（无论如何，它将是毫无意义的）的宏愿，在上文中，我已经提到了一种共存，即，它是在1750-1950年间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躁动不安与艺术文化领域内的创造性迸发之间的。就当前阶段而言，它也足以说明事实。1950年之后的情形伴随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精神创造领域内的颓丧。在哲学中，对过去的作家所做的历史的和文本的评论与诠释，已经成为思想的替代品。这种做法开始于海德格尔II（后期海德格尔），并通过表面上对立但却导致同样结果的方式被理论化为“诠释学”和“解构”。更进一步的措施则是近来对“弱小思维”的美化。在这里，任何批评都将是不合适的；人们将不得不钦佩这一无能的坦率的自白，假如不是伴随着模糊不清的“理论化”的话。当然，科学扩张会继续，但人们想知道这是否不只是一种惯性运动。如同在一开始的1/3个世纪里所取得的那些理论成就——相对论、量子，在过去的50年里没有任何比较（一个可能的例外也许是分形、突变和混沌理论的三位一体）。当代科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在那里，人们期待的至为重要的结果便是宇宙学；其理论框架就是相对论和写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弗里德曼方程。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对现代物理学巨大蕴涵的理论-哲学探索的贫困（众所周知，这些蕴涵对于承继而来的思想的大多数基本前提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如果技术进步还没有加速的话，那么它将继续有增无减。

如果能够如上述在艺术领域中被描述的那样，“现代”时期被定义为对于新形式的自觉追求，那么，这种追求现在则明确地全然被抛弃了。如今，折衷主义和过往成就的重组再生依然风头强劲。当唐纳德·巴塞姆写作《拼贴是20世纪所有艺术的主要原则》（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和马蒂斯无关于“拼贴”）的时候，他弄错了日期，但意义却正确。的确，“后现代”艺术帮了一个很大的忙：它显示了现代艺术曾如何真正伟大。

四

从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定义和捍卫的各种尝试中，从对时代精神的某种熟悉中，人们能够获得一种概要性描述，它是关于当前趋势的理论原则或哲学原理。在约翰·阿纳森出色的表述中，这些原理是 ⑤：

1. 拒绝所有把历史看作进步或解放的观点。这种拒绝自身完全是正确的。它不是新问题，但在后现代主义者手中它有助于消解这一问题：因此，是不是所有历史时期等同于所有社会-历史制度？反过来，这导致了政治的不可知论，或者导致了由后现代主义者或他们的兄弟们所表演的滑稽可笑的杂技，当他们认为不得不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的时候。

2. 拒绝一种统一的、普遍的理性的观念。在此，这种拒绝又一次完全是正确的；它远不是什么新问题；而且，它起到了掩盖如下问题的作用，这一问题开启了逻各斯和理性的希腊-西方的创造：我们如何思考？是不是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或无关紧要的？

3. 拒绝以一种合理性和功能性的单一的奠基性原则为基础而对文化领域（如哲学和艺术）进行严格的区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混乱的，而且它贯穿了许多重要问题。仅举一例：每一次，文化领域的区分（或缺乏这种区分）都是一种社会历史创造，是社会问题中的整个生活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不能抽象地被检验或否决。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希腊-西方的延伸带上，对文化领域进行区分的过程也无法表达理性的某一单一奠基性原则的含义，无论那也许意味着什么。严格说来，这将是黑格尔式的建构。被区分开来的不同文化领域的统一性，在古代雅典和在西欧，不是在合理性或功能性的某一奠基性原则中被找到，而是在这一事实中，即所有领域以其自己的方式和假借分化的名义体现着特定社会的想象意义的同一内核。

我们这里所有的是，对于渗入到躲避的各种分层之中的一大半真理的回忆。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前的趋势。它的痛苦是，它只是通过一种对盲从和平庸的假模假式的“护教学”来合理化它们。沾沾自喜地、随意地但却时尚的谈论着“多元化”和“尊重他者的差异”，它结束了对折衷主义的赞美和对思想贫乏的遮掩，以及提供了一种“任何事都可能”原则的一

般化版本，以便费耶阿本德在其他领域加以适当庆祝。可以肯定的是，盲从、思想贫乏、平庸和“任何事都可能”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后现代主义，一种用“辩护的正当补充”加以修饰的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抛弃其批判功能并狂热地坚持“有公正因为它在那里”的观点的最新例子。后现代主义，无论是作为具有影响的历史趋向，还是作为一种理论，都是对于现代主义的真正否定。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种功能——在上文，这种二律背反被概括在自治的两种核心的想象意义和“理性支配”之间——尽管彼此相互污染，但在“现代”时期，对现存制度现实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伴随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祝福，这一点恰恰在当前迅速地消失了。随着一种真正批判精神的逐渐消解，“现实”领域内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消弭，开始在知识和艺术领域内找到合适的对应物。如上所述，这种精神仅仅能够存在于和有什么相关的那种距离的建立之中，且通过它存在。因此，当前时期最好被定义为普遍地倒退到盲从主义。当全球亿万电视观众每天汲取着同样的无知，当理论家们还到处重复着人们不能“打破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的时候，这种盲从主义通常就实现了。

五

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只要现代性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虚假）理性的（虚假）支配的无限扩张的想象的意义，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并且，它正着手于一项对人类而言孕育着严重危险的疯狂的进程。但只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社会和个人自治事业的同时展开为其决定性条件的话，现代性就结束了。资本主义发展着，然而它不得不面对一个反对现状的持续斗争；在工厂的地板上和在思想或艺术的领域中，资本主义扩张——如果它没有任何有效的内部反对派的话——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动物。自治事业自身无疑没有完成。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其发展轨迹足以证明它的根本不足，至少可以说，在它已具体化的事业中（无论是自由共和国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如此。而几乎不需要再强调这一点，即历史事实中这一不足的证明是当前政治冷漠和私有化的根源之一。因为自治事业的复苏，必须要有新的政治目标和新的人类态度。但就目前而言，这种变化的迹象几乎没有。与此同时，试图决定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一个长期的插曲，或是我们是否正在目睹西方历史——即它作为一种与自治事业相联且由其共同决定的历史——之终结的开始，这将是荒谬的。

注释：

- ① Michel Foucault, “Un cours inédit”, Magazine Littéraire, May 1988, p. 36.
- ②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l.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p. 13.
- ③ Ibid., p. 43.
- ④ C. Castoriadis, “Modern Capitalism and Revolution (1960—1961)”, *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2, (1988), pp. 226—343.
- ⑤ Johann Arnason, “The Imaginary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Vol. 86 (Autumn 1989), pp. 323—337.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作者C. Castoriadis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本文原发表于Democracy & Nature, Vol. 7, No. 1, 2001。译者方珏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